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综述

一、国外文化变迁研究综述

文化变迁是人类学、民族学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以斯宾塞、泰勒、摩尔根、弗雷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学派认为：人类文化是不断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发展进化的。摩尔根认为物质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是人类进化的原因。传播学派侧重于研究文化的地理、空间与地方性变异，它原则上并不否认文化的历时变化，但更倾向于从传播的角度重构一部庞大的人类文化史。该学派认为：“传播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全部人类文化归根结底是文化传播、借用的历史。”此外，功能学派虽着重于社会文化的功能、结构的研究，其论述文化现象的变化着重于论述其功能的变化、消失与替代，但也注意研究文化变迁。马林诺斯基把进化过程直接理解为文化变迁。他写了《文化变迁的动力》一书，对文化变迁作了具体的论述，他认为社区内部所引起的文化变迁是由于独立进化，而不同文化接触所产生的文化变迁则源

于传播。他甚至认为借用与其他的文化创新形式一样具有创造性。由弗朗兹·博厄斯 (Franz Boas) 和他的学生与追随者组成的美国历史学派认为，每个文化集团都有其独一无二的历史，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他对考古学资料和民族志资料进行分类归纳时，产生了以“文化区”为核心的一系列分析概念。但无论如何，传播学派的一系列思想的影响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而且通过历史学派，直接成为文化变迁研究的理论素材。

继美国历史学派以后，二战后兴起的心理人类学派的文化变迁理论更侧重于不同文化接触过程中个人认知、适应途径及人际关系等的定量分析。其代表人物哈勒威尔 (Hallowell) 于 50 年代将文化变迁的过程划分为若干阶段，并采用心理测定法对文化变迁的程度进行测定。心理学派以文化与人格为主题，他们关于文化适应、社会文化的心理过程、文化对人格塑造等重大问题的研究，极大地刺激了后来文化变迁研究的许多方面。美国新进化论学派的复兴与形成，也给文化人类学中文化变迁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以怀特 (Loslie White)、斯图尔德 (J. H. Steward) 等人为代表。怀特认为只有技术才是文化发展的原因，认为文化是一种独特的现象，是超有机体的，时间上持续的事物，有自己的组织原则和运动规律。第二代新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

塞维斯 (E. Service) 和萨林斯 (M. Sahlins) 把“ 一般进化” 和“ 特殊进化” 理解为人类进化不同的真实侧面。

总之，从最早产生的古典进化论，经传播学派、历史学派、功能学派，到心理学派、文化相对论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等，尽管各自侧重的角度与关心的课题互不相同，但是，由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变迁是人类文化的本质属性之一，因此，以各民族的文化创造为基本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中的各种理论、学说和流派，也就都有意无意地在不同层面，从不同角度探索过人类文化变迁的奥秘。

二、国内文化变迁研究综述

1. 关于民族文化变迁的研究

国内对文化变迁的研究起步较晚，改革开放后逐渐兴起。费孝通先生在《反思·对话·文化自觉》(1998) 一文中提出，民族文化生存发展的出路——勇敢面对文化转型。段超在《略论改土归流后土家族文化的变迁》(1991) 一文中指出，清雍正年间，中央政府在今土家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这是土家族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变革，它对于土家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柏贵喜在《土家族传统文化的当代变迁》(1992) 一文中提出，土家族文

化变迁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土家族文化在历史上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变迁。李富强在《壮族婚姻文化的变迁》(2000)一文中指出，在壮族婚姻文化变迁中新的因素与传统的内容是可以糅合共存的，壮族婚姻文化变迁的重要内容和动因是传统婚姻圈的打破。田敏在《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变迁的旅游效应再认识》(2003)一文中指出，旅游对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变迁会产生有利与不利影响，提出民族社区社会文化的旅游效应的两面性是一种本质属性，必须给予正确认识、科学处理，以推动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变迁的良性发展。李吉和在《古代少数民族迁徙与文化变迁》(2003)一文中指出，少数民族迁徙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往往会导致其文化的变迁。秦海燕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盘家瑶族文化变迁》(2005)一文中分析了盘家瑶族文化变迁及其对发展当地生产力、改善当地人们生活条件、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促进作用。龚锐、金燕在《当代西藏珞巴族社会文化变迁调查——以米林县南伊珞巴民族乡琼林珞巴村五位村民为个案》(2008)一文中分析了西藏珞巴族的社会文化变迁。罗连祥在《民族文化变迁的规律分析》(2014)一文中探讨了民族文化变迁的规律，对保护、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代维在《乡村旅游与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变迁——以芒市镇芒核村的研

究为例》(2015)一文中分析了通过乡村旅游,游客可以体验到与城市不一样的景色和文化,但也将城市文化带入到乡村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乡村文化的变迁。

随着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深入,我国一些特殊族群的文化变迁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谌华玉著有《粤东畲族(族群认同与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一书。此书采用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调查法、参与观察法和深入访谈法。此书收集和使用的材料不仅涉及许多间接的文献记录,还包含大量来自田野调查的第一手口述文本、观察笔记和图片、照片等。此书通过客位与主位并列呈现的不同叙述,以及历时与共时互相映衬的不同摹写,叙述了畲族的族称由来、边界确立以及当代粤东三个主要畲族村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民族认同实践和社会文化变迁过程。此书在叙事和阐释脉络中逐渐体现出当代畲族族群认同的“畲文化记忆与汉文化现实”的本质特征。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合著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书首先介绍了生态环境与村庄,接着介绍了村庄的土地制度、人口与生育制度、乡村企业的兴起与社会分层趋向等内容。艾比不拉·卡地尔、雷琳合著的《罗布人·绿洲文化变迁的人类学研究:以喀尔曲尕乡个案为例》一书一方面指出了生态环境的

恶化致使罗布人失去其传统文化原有的生存基础，另一方面又指出罗布人迁入维吾尔社会文化环境后，在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引导下，罗布人的文化形态越来越被维吾尔主流文化所取代，其族群认同也呈现出维吾尔化的趋势。

杨华在《回族民俗文化变迁与社会性别研究》一书中介绍了在我国 56 个民族中，回族人口数量众多，2010 年，回族人口已超过 1000 万，回会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此书又指出，回族长期以来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回族在西北一些地区既高度集中，又在全国各地处于大分散的状态。在全国 2000 多个县中，县县有回族，回族成为我国分布地区最广的少数民族。

2. 关于地域或社区文化变迁研究

学术界对地域或社区文化变迁的研究，重点关注该地域或社区内某种文化的传统特点、传承与变迁的现状、变迁中的成功经验、变迁的动因及策略等。如加芬芬、吴晓燕在《农村社区文化：变迁与重构》(2013)一文中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促进了我国农村社区文化的转变，农民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均发生了现代性变迁。

然而，历史和现实原因导致农村发展滞后，发展动力的缺乏和外部支持的不

足等制约了农村社区文化的发展，为此，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格局、构建新的社区认同等成为重建农村社区文化的现实选择。韦仁忠的《关于民俗变迁、文化整合的新思考——甘肃省天祝县汉、藏民族杂居村落藏族生活变化探微》(2008)一文对杂散居地区文化发展变异的现状进行了考察。张兆远在《农民工对农村文化变迁的作用》(2007)一文中分析了农民工对农村文化变迁的作用。马尚林在《少数民族生态移民中的文化变迁——以凉山州盐源县长坪子村为例》(2005)一文中以凉山州盐源县长坪子村为例分析了少数民族生态移民中的文化变迁。王俊敏的《居游之间：游牧、采猎、渔捞三型游文化变迁与生态重塑》一书着重研究了中国游牧、采猎、渔捞三型游文化变迁与生态重塑，即内蒙古蒙古族的游牧文化变迁与草原生态重塑、兴安岭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的采猎文化变迁与森林生态重塑、太湖汉族的渔捞文化变迁与湖泊生态重塑的相互影响。此书特别对游牧文化转向“居游之间”、处于“进退之际”的矛盾状态和变迁机制进行了分析，旨在揭示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互赖共生、衰荣与共的关系，挖掘和展示中国各区域丰富深厚的传统生态文明资源，破除国人的“单面线性进化论”和“现代化进步观”观念，为化解文化和生态双重危机、重建中华民族和人类生态文

明提供借鉴。张曙晖的《滇西北怒江流域巴尼人的民族认同与文化变迁》一书，以分布于滇西北怒江流域白族各支系中生存环境最封闭、古老文化保留最完整、发展程度最滞后的“巴尼人”为研究对象，将“巴尼人”与大理白族、滇西北澜沧江流域的“那马人”及滇西北怒江流域的傈僳族、怒族等民族置于一个共时性的互动关系之中。此书采用“客观文化特征研究法”和“主观认同研究法”相结合的方法，在近乎全面的文献占有的基础上，从历史的纵向和横向上充分展示和探究了巴尼人在社会经济及人口、族称、族源、语言、宗教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文化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解答了这一群体所产生的民族认同的相关缘由和问题，反映了民族认同与文化变迁的关系。同时，此书也体现了中国少数民族支系在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发展变迁之后，在民族认同上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

3. 着眼于发展的文化变迁研究

二十一世纪以来，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以发展为视角或背景来研究文化变迁。高登荣在《经济生活与社会文化变迁——对云南坎村彝族的考察》(2002)一文中对云南坎村彝族经济生活进行了考察，认为由国家实施的计划变迁仍然是以后少数民族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蒋辉、赵奇钊、刘仁贵在《旅

游业：民族地区文化变迁的双刃剑》(2005)一文中分析了民族地区旅游业与传统文化的协调发展，提出应正确地看待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问题。邢莉的《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一书运用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生态学和草业科学等学科交叉的方法，对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历程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研究成果在同类著作中处于前沿水平，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其中对清代以来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机制、变迁动因、变迁结构、变迁形态的深入阐述，以及对游牧民与农耕民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的精彩论述，不但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近年来，国内文化变迁研究的成果丰硕，但仍存在一些待改进的问题。一、在研究方法上，创新性与科学性不足。国内研究理论来源大多是二十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学者翻译与引进的一些论著，其中也包括涵化、传播和动力等方面的理论建构，甚至有的研究直接机械套用国外的理论。在研究范式上，普遍采用以传统的民族志描述为主，以田野调查为辅的研究方法，对现代调查技术与分析等研究方法吸收运用还不够。国内研究学者往往局限于单一的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哲学等学科知识，知识面相对偏窄，也缺乏多学科知识交叉与整合的意识与眼界，从

而难以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变迁的完整图景作出全面而客观的阐释。

三、瓦乡人文化研究综述

瓦乡人，是指居住在湖南省沅水中游及其支流流域，以沅陵、泸溪、辰溪、溆浦和古丈等县交界地带为主要分布区域且具有独特文化和语言“乡话”的族群。据调查，瓦乡人人口达 50 多万人，其中沅陵县瓦乡人人口最多，达 30 多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些学者相继对瓦乡人文化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这些研究起始于二十世纪 50 年代对瓦乡人语言性质的讨论，如杨蔚在《湘西乡话语音的内部差异》(2009)一文中从语音角度探讨湘西乡话的内部差异，列举了声韵调 10 个主要差别，并在此基础上，对比周边汉语方言的情况，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她指出乡话受周边汉语方言的影响，从边界到腹地正在发生语音分化，并将这种变化情况分为三种：带区域性特征的语言波的扩散、方言的地缘水缘关系的影响、双语区强势方言的渗透。蒋冀骋在《沅陵乡话 z 声母的形成及其所反映的语音历史层次》(2006)中探讨了 z 声母形成的音变机制。瞿建慧在《泸溪乡话与泸溪湘语的语音比较及语音演变》(2012)中指出泸溪乡话和泸溪湘语孕育于同一母体——古楚语，在演变